

【社会观察】

# 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立国之本？

□傅国涌

作为立国之本的教育是需要有理想主义底色的，而不是日复一日总是苟全于现实主义的泥潭当中。无论是追溯孔子的传统，还是古希腊的传统，从本质上说，教育的真谛都蕴含在独立和自由当中。

“教育为立国之本”，这个说法今天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甚至会被当成口号来喊。然而，当一个古老民族尚未从科举制中迈出来时，要说出这句话，不仅要有超前的眼光，还要有辞旧迎新的大勇气。1904年6月18日，才华堪比李清照的女词人吕碧城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教育为立国之本》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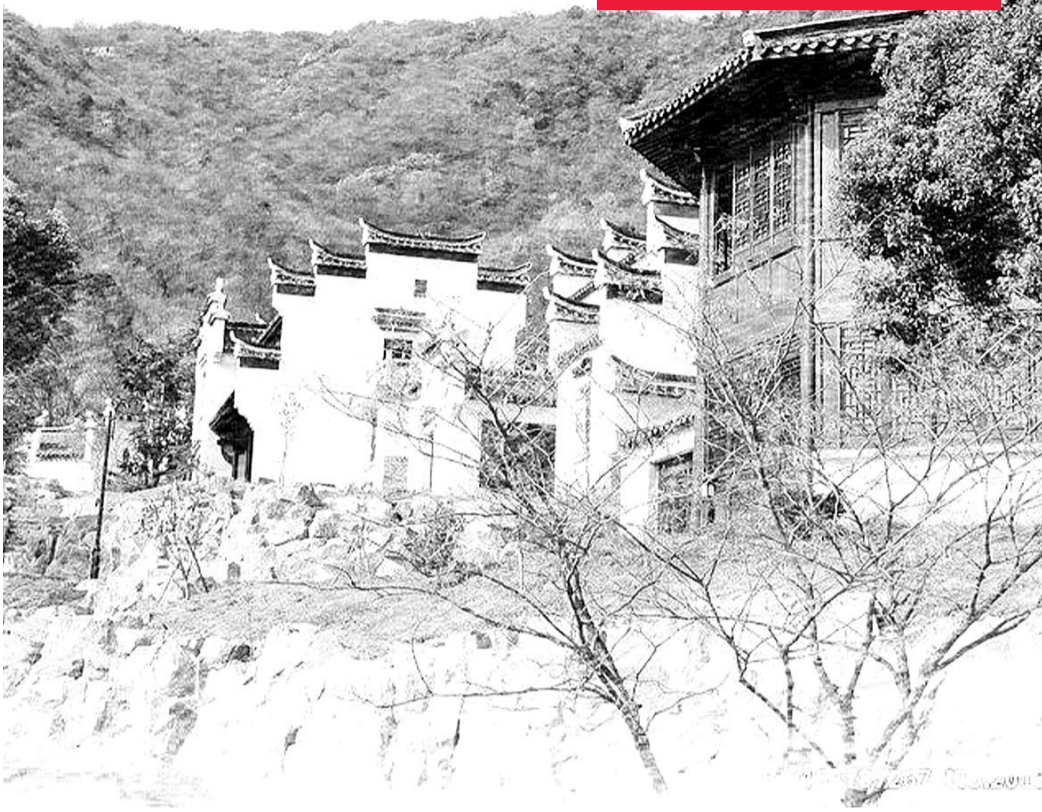
在上个世纪之初，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吕碧城意识到中国已进入充满竞争的世界，从兵战、商战到学战，她分析，如以为兵战可恃，当亚历山大、拿破仑鼎盛时期，威震全欧，谁能与之争锋？然而一旦战败，惊骇一时的武略也就随之湮灭。如以为商战可恃，上古埃及、波斯等国的工艺商业也不可谓不盛，如今早已散为流亡之种族。世界上真正有持久竞争力的还是学术，在她当时有限的了解中，想到了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认为他们掌握着转移世界的大权，这不是世上眼见的那种权势，却是19世纪文明的原动力。“文明的原动力”——这个说法很精彩，是包括她在内的那一代中国读书人对此难得的认知。一个民族要产生自己的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需要“兴学校、隆教育”，她认为这是“当今之急务”。

当时新教育初兴，与千年浸染的旧式教育相比，无疑是一棵幼苗，尚不大为国人理解，国人念兹在兹的还是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所以，她要大声疾呼，为新教育张目，阐明“教育为立国之本”之理，她说：“教育者，国家之基础，社会之枢纽也，先明教育，然后内政外交，文修武备，工艺商业诸端，始能运转自由，操纵如意。若教育一日不讲，则民智一日不开；民智不开，则冥顽愚蠢，是非不辨，利害不知。所知者，独自自利而已。”

从旧式教育出来，在旧体诗词上有卓越表现的吕碧城，却热衷于新教育，在举世瞩目于富国强兵之际，把目光投向了迂缓的教育，认为富强的根本“非兴学校为普通强迫教育不可”。相距一百一十年，我们的外部环境早已发生变化，教育已然普及，问题也随之转换，今天要追问的不是教育是否为立国之本，而是：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成为立国之本？怎么样的教育才有可能产生“文明的原动力”？怎么样的教育才能真正开启民智，而不是培养只知道自私自利的人？吕碧城当年还用不着思考、来不及面对的这些问号就在我们的面前。说穿了，就是要认清教育的目标，如果把富强作为目标，教育不过是手段，教师和学生充其量也只是作为机器上的零件，终究还不是主体。如教育是以开民智为目标，也就是以造就具备健全心智、有明辨是非能力的人为目标，教师和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就是第一位的，没有独立思考，一切不过是原地打转，做做习题，背背标准答案，练练应试技巧，教教答题诀窍，这样的教育能不能成为立国之本？我相信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教育最多也只能造成一代又一代精明的自私自利者，却不会产生出文明的原动力。

作为立国之本的教育是需要有理想主义底色的，而不是日复一日总是苟全于现实主义的泥潭当中。无论是追溯孔子的传统，还是古希腊的传统，从本质上说，教育的真谛都蕴含在独立和自由当中，教师凭着独立、自由之精神，在知识和精神世界里驰骋；学生同样凭着独立、自由之精神，在知识和精神世界里求索，老师与学生、老师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他们的生命相互碰撞、相互连接，在课堂内外彼此启迪、彼此建造、彼此成全。通过教育，每个人的思想天空进一步拓宽，每个人精神的翅膀进一步展开，这样的教育才是令人向往的，也是教育的现实中所匮乏的。一旦失去独立与自由的精神，教育绝不可能成为立国之本，在一个教育普及的时代里，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教育，尤其值得深思。很多人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从现实的条件出发，这诚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丧失底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分清楚“是什么”和“要什么”，不能不断地降低标准，不断地承认既成事实，最终连方向和目标都找不到了。重新找回方向和目标，需要向教育的真谛回归，那是吕碧城时代还无需直面的问题。

（本文作者为近代史研究学者，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等书）



【窥海斋】

## 永远的乡间，永远的乡下人

□林少华

说到底，城市终不过是自己人生旅程中一座座巨大而辉煌的中转站，而终点站仍是荒野小站——那个曾是始发站的仅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

上海。来上海开会。无须说，较之会上的发言，还是会下的发言更能畅所欲言，更能推心置腹。与会者中有一位某上海名校举足轻重的副职，绰绰有余的副厅长，我和他交谈最多。这倒不是因为我想和副厅长级套近乎沾官气，而是因为彼此是二三十年的老相识了。那时他当然不是副厅长，大体和我彼此彼此。同样一身看上去相当够档次的地摊货，同样一副傲慢和谦卑难分彼此的神情，同是平头教员，开会住同一个房间，一同研讨领带的若干种打法。

今非昔比，如今我们都有了若干套真正够档次的西装和若干条有可能得到女性礼节性夸奖的领带。这回研讨的，则是若干年后退休的打算。这方面我可谓蓄谋已久，兴致勃勃地坦言相告：退休第二天就卷起铺盖打道回府，返回乡下老家。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吃瓜，种豆吃豆，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激素，吃起来是何等开心何等放心何等……我正说得来劲儿，副厅长忽然以副厅级的语气插话进来：“那么我问你，既然不用化肥，那么就要用农家肥吧？‘文革’上山下乡，你我都在乡下干过几年农活儿，难道你不知道牛屎猪屎是真的？再说自己种瓜种豆能种出几个品种？可城里超市有多少品种？我说老兄，陶渊明陆放翁吟得做不得的。去乡下种瓜种豆？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是啊，当年我们都同样干过农活儿，几年后同样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毕业后同样教日语搞翻译。不同的是他后来有了行政级别而我却没有，但我总觉得这点不足以从根本上决定我们对种瓜种豆的态度。那么，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我明白了，是出身！他出身上海，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离开上海又返

回上海，去安徽乡下务农只是他人生旅程中临时停靠的荒野小站，如一颗偶尔偏离运行轨道的行星。一句话，他是城里人——“阿拉上海人！”实际上他也很快撇下我和另一位与会者讲上海话去了。于是，我一个人拐去一条荒草隐约的砖铺小径。我没有为此产生失落感，反而觉出几分释然。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上海话是上海人的精神故乡，是上海出身的城里人的胎记。

我呢？我不同。我出身农村，说得文学些，出身乡间，是乡下人，而且是毫不含糊、毫无折中余地的乡下人。乡下是我的“阶级烙印”和精神胎记。四十余载的城市生活固然是我冲破乡间时空限制的成功尝试，是表现乡下人生命能量或其灵动的奋力突围，但说到底，城市只不过是己人生旅程中一座座巨大而辉煌的中转站，而终点站仍是荒野小站——那个曾是始发站的仅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这意味着，我仍是乡下人。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自由奔放而又危机四伏的羁旅之后，旅人越来越思念自己出走的故园空间，思念屋后的土豆花南瓜花，思念房前的黄杏和歪脖子垂柳，进而回归宁静而带有荒凉以至终末意味的乡间，让生命的强度和广度在此渐次弱化、收敛以至衰老——在故园的花草树木的拥抱中，在清晨鸟叫和傍晚蛙鸣的陪伴下……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条马哈鱼，无论在大海中游出多远，无论海底龙宫的公主们多么妖冶迷人，无论海面的惊涛骇浪多么催发斗志，也还是要游回自己出生和出走的地方。那个地方，对于上海人就是上海，对于我这个乡下人就是乡下。这一宿命式取向，可能无关乎副厅级或正高级，无关乎“中转”的时间跨度，而更关乎出

身——关乎“烙印”，关乎“胎记”。

不过，那个仅五户人家的小山村是回不去了，它已被附近石场那个巨大的“鼠标”彻底删除。作为替代符号，我在当年的公社所在地、如今的小镇的镇郊山脚得到了一处院落。“五一”回来一次，新栽了二三十棵柳树榆树柞树山核桃树，确认了去年栽的四五十棵李树杏树海棠树。宿根的蜀葵那时就已忽一下子蹿出地面，及膝高了，舒展的叶、挺拔的茎，绿油油迎风摇曳。在青岛城里伏案读书的间隙，或晚饭后散步的路上，我每每想象树上的新叶和蜀葵的花蕾，想象弟弟代种的瓜豆，想象傍晚远山迤迤的晚霞和夜空劈头盖脸的星星……越想越盼暑假的到来。

现在，暑假终于到来，我终于返回乡下。写这篇小稿的此时此刻，蜀葵正在窗口盛开怒放，粉的、白的、白里透粉的。新栽的海棠树正在门前炫示崭新的叶片。再往前一点点，去年栽的樱桃树已经缀满娇滴滴圆滚滚的红色珍珠……

我到底属于这里，属于乡下——永远的乡间，永远的乡下人！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